

论研究和社团管理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深入开展对学生社团的组织性质、成长规律和时代特征的研究,以及对新时期学生社团管理与指导工作的研究,已经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迫切需要。

近年来国内对学生社团基本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已经产生了不少成果,但仍存在一些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一方面,学生社团的类型研究和功能研究仍然停留在“粗放型”阶段,现有的研究过于强调学生社团的宏观育人机制而忽视了学生社团的微观育人机制——对学生社团的分类讨论不深,对不同类型社团的育人功能以及育人机制开掘不够;另一方面,对高校社团发展中的普遍性问题还缺乏体制机制层面的研究,使得一些在学生社团发展与建设中出现的现实难题没有从理论上得到富有建设性、指导性的解答。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广泛深入地开展实证调研的基础上,运用多学科的理论视角与分析工具,积极探索高校学生社团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和基本规律,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学生社团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并能对其进行更具针对性和时效性的管理与指导。

二、基本框架

本书旨在探讨和分析“高校学生社团组织”与“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关系”。总体而言,“大学生成长成才”是目的,而“高校学生社团组织”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之一,我们就是要揭示手段与目的之间的适配性,并在此基础上对完善手段实施机制和提高手段实施效能提出优化方案。

在“目的—手段”的研究框架之下,首先要搞清楚目的是什么,也就是:何为“大学生成长成才”?

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既要有普遍性思考,即基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明确现代社会对于年轻一代成长与发展有哪些相对稳定和持久的客观要求,也要有针对性分析,即着眼于当代大学生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生长环境,调查和了解他们自身成长与发展的实际需求,进而区分哪些是值得褒扬的、哪些是值得鼓励的、哪些是应予尊重的、哪些是应予引导的。

其次,对于手段——“高校学生社团组织”,则可从本体和功能两个方面加以分析和研究。

高校学生社团组织的本体研究,主要包括其法律地位、组织特征、

尤其说出了青年的心声。即将迈入社会的他们即便不至于“毕业即失业”，却也沦为“房奴”，为一个“蜗居”而奔走。

生活压力让当代青年具有深刻的二重性，他们曾满怀激情、豪情万丈，他们又直面人生、异常现实。因此他们与父辈相比，格外关注现实、关注自身、关注生活质量，也格外对生活和社会压力敏感。

（二）就业发展的压力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的快速更新使得“知识爆炸”不再是危言耸听。就算是接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如果不及时给自己充电，也有随时被社会淘汰的危险。“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多年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民生话题，更成为压在“80后”、“90后”身上的一座沉重的大山。不断加大的生活压力、日益高昂的生活成本和追求高品质生活质量更成为他们共同面对的现实难题。

青年学者廉思用“蚁族”生动地形容“80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指的是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或工作收入很低而聚居在城乡结合部的大学毕业生。在他的《蚁族》一书中，他认为这一群体“高知、弱小、聚居”，是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因此，反映他们生活状况的影视作品也每每勾起了他们的“痛与乐”。电视剧《奋斗》便描述了“80后”对完美的追求和现实中遇到的不可逾越的窘境与两难。相关题材影视的热播是青年人心事的反映，逐渐走入社会的“80后”、“90后”压力之下不管是“怀旧思潮”泛滥，会为无关痛痒的李磊和韩梅梅“集体失恋”，还是“寂寞”、“杯具”迭出，会为身边的鸡毛蒜皮而“集体愤懑”，都变得可以理解。

（三）社会转型的压力

“80后”、“90后”作为改革开放后出生和成长的新一代，是这个时代变革的最大受益者，也是这个时代变革带来的观念、生活方式变化最先冲击的对象。新旧文化、东西文化的冲突在他们身上也表现得更为明显，生活方式和思维方法已经和他们的上辈人出现强烈的“代际差别”。他们接受了中华传统美德和文化的滋养和熏陶，也接受着西方思潮和流行文化的浸染和影响。伴随着快餐、摇滚乐、大片等文化符号，西方价值观的渗透显而易见。随着传统社会的父母模范文化的衰微，权威文化、一统文化的空间日渐狭小；非正统、疯狂、张扬、叛逆等文化表现纷纷登堂入室，扮演着越来越令人瞩目的社会角色。^① 而

^① 陆士桢. 关于“80”至“90”后及其教育引导——青年工作与共青团工作的新思考.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9, (2): 4.

小白兔

1) 提醒大家不要落东西,并负责最后检查,特别是上下车时、休息后;

2) 强调环保,提醒大家收拾垃圾。

财务

1) 活动前收钱记账,与后勤沟通核算;

2) 出发时带好适量现金;

3) 结束后核算账目,退补费用。

押后

1) 保证安全,确保没有人掉队;

2) 出发前熟悉路线;

3) 活动中帮助和鼓励落在后面的队员;

4) 活动中及时与向导、领队沟通,注意控制队形和行军节奏;

5) 根据实际情况可适当从队医那里分一些外伤类常见药物。

无职务老队员

希望老社员能以身作则遵守各项纪律,积极关心帮助新队员,向他们传授知识经验等。

(资料来源:北大未名 BBS 山鹰论坛(puma) <http://www.bdwm.net/bbs/index.php>)

《社会契约论》等书籍。他每个月都会抽出一两天的时间和一些同样钻研这些书籍的同学在一起开个讨论会。

肖卿是北京大学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简称青马研)的一名会员。兴趣广泛的肖卿从中学起就对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有所涉猎。进入大学之后,“卧谈”成了“必修课”之一。卧谈中的话题说着说着就转到国家大事上了,同学之间对国家政策、经济发展、社会现象等都不免会有一些争论。

肖卿不愿意让这些争论总是停留在表面,“想要寻求分歧的根源”,这是他开始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最初动力。

怀着这样想法的肖卿在发现青马研这个社团的时候如获至宝。青马研组织会员围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学习资料进行研读,每周组织社团内部成员和其他有兴趣的同学在一起共同学习,共同研讨。

他们的论题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包括: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中国20年以来的改革思路以及评价,21世纪中国改革的突破点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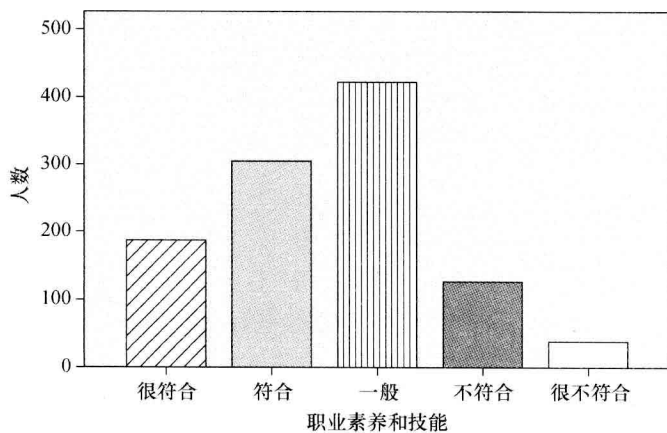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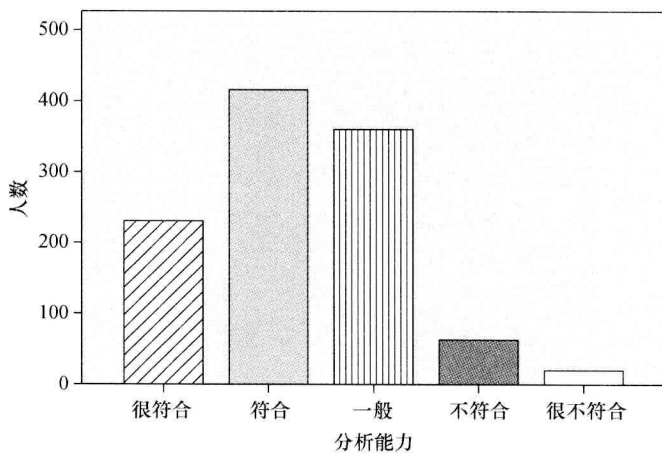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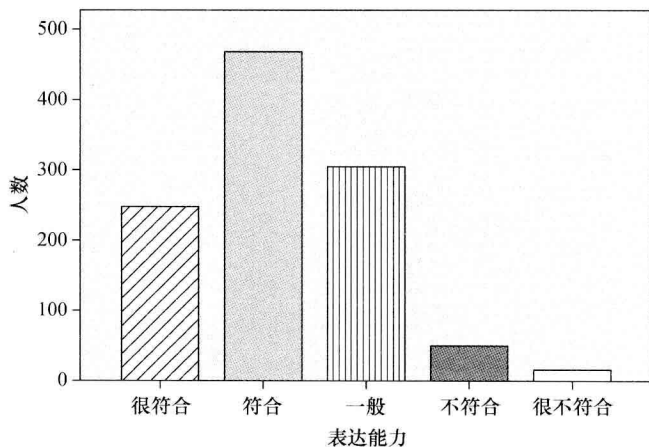
肖卿觉得,这些讨论是开放的、自由的,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不管持何种观点都以理服人。就在这样的思想碰撞中,“真理越辩越明”。

青马研会长、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赵昱博介绍说,北大青马研成立于2001年7月1日,很快在北大社团的“百团大战”中崭露头角,连续6年被评为“北大十佳社团”,在全校有160多名骨干会员。截至目前,北大已经有十余个院系的几千名学生听过研究会成员讲的理论课。

赵昱博说,理论社团之所以能在学生中产生影响,传播的思想能够为学生接受,是因为学生自己建立的组织本着“学术讨论无禁区”的原则,放低姿态,用平等的态度和学生沟通,“不是要打倒谁的观点,而是在相互交流中提高”。

除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学生们还十分关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青马研的成功并非个案,清华大学的学生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协会自1995年成立以来,协会会员总数达到了4000余人,是全校最大的学生社团。



在充分认识学生社团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学生社团的组织特性和外部环境,也会对大学生产生消极影响。加强高校社团的管理与指导,目的就是要兴利除弊、扬长避短。

鉴于高校青年自组织与学生社团具有本质上的相通性,两者的区别已在前文进行了阐述,因此,本部分的讨论总体上也适用于高校青年自组织。

在本章中,我们主要讨论学生社团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产生这些问题的背后动因。

第一节 学生社团组织与活动的一般性问题

一、社团组织的松散化

任何组织只有形成了合理有序的治理结构,使得组织成员民主参与与决策,并保证一定的运行效率,才能够有效地平衡外部的输入要求与内部的多方参与,实现组织的健康发展。而目前不少高校学生社团组织都存在着因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而导致的“组织失灵”问题:对内,表现为集体行动由于个人意见不一致而无法达成共识,缺乏对组织成员的控制等问题;对外,表现为可调动资源不足等问题。

有人说社团工作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一是指协会组成缺乏合理性,大一、大二参与学生人数较多,大三学生零零星星,大四学生几乎无人参加;二是指协会活动有始无终,往往是“昙花一现”。调查中发现,部分社团没有一个完善而明确的内部管理章程,或章程仅仅流于形式,未能有效执行、严格管理,结果成员流失严重,一开始红红火火,到后来冷冷清清。

二、社团管理的人治化

“能人治理”是社团治理结构的一个突出现象。一方面,对社团进行有效干预和积极影响,必须对“能人”给予足够的尊重并允许其拥有足够的掌控能力;另一方面,如果片面依赖“能人”的人格魅力和工作能力,忽略了制度化建设,就会为社团的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在实践中,“能人治理”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一言堂”式的不民主,缺乏对“能人”专断的有效约束和制衡;

比较完善的章程制度，“它还依据自己的章程在学校内部发挥管理、协调、自律的作用。这种通过民主体管理自律原则实施的学生自我管理，既增强了美国大学生的法制意识，又强化、提高了管理工作实效”^①。

【资料 7.1】 哈佛大学学生社团的批准条件

(1) 社团章程和细则的会员条款不应有种族、教义、肤色、性别、性倾向或残疾等方面的歧视；

(2) 提交完整的社团干部和会员名单，所有社团干部必须是注册在校生，会员不少于 10 人；

(3) 要有两位教员顾问的接受函，且两位教员顾问都应任职于哈佛文理学院；

(4) 要有充足合理的证据证实有能力承担财政责任；

(5) 在正式认可之前要有学院生活委员会的推荐。

(资料来源：《哈佛大学学生社团管理规则》)

“美国高校的学生工作系统有一个发展过程，现在一般由教务长办公室主管。在历史上曾经由校长直接管理。”^②在社团管理方面，美国高校一般设有专业化的管理机构。当前，美国高校负责社团工作管理的机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隶属于学生事务处的“社团辅导室”，类似于我国高校团委或学生会下以往的“社团部”，要负责学生社团的成立审批、监督考评、活动指导、经费划拨及其他必要的支援；一种是类似于我国的“学生社团联合会”，如“学生社团委员会”、“学生社团政府”，这些机构一般以主管学生事务的院长或副校长为主席，也有的以教授为主席，而委员会成员大多数是学生，个别委员为教师。委员会主管社团组织及活动的政策，接受新社团成立登记，判定社团活动违规以及担任学生社团组织及活动的顾问等。许多大学规定，学生社团至少需要聘请一位教职员担任顾问，有关社团重要申请表、租借场地、经费申请等都需要顾问签字。顾问一般都有服务经验，拥有各种社会关系，有助于提供宝贵经验，维持社团发展，帮助解决经费等实际困难。

美国高校学生社团的自治权相当大，同时美国高校负责学生社团工作的事务部门大多制定有详尽的向学生社团提供经费资助的条件和经费管理、使用制度。如《耶鲁大学学生社团管理规则》规定，社团的任何收入不能为社团组织中个人所得，特殊情况下，社团要支付会

① 许云昭，石鸥著. 差距与超越——中美教育比较研究.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17.

② 陈立思. 当代世界的思想政治教育.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107.

的育人理念理解得更为深刻、贯彻得更为得力,从而能够将“管理”和“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而学生会作为学生组织,尽管更为了解同学的需求和特点,但对高等教育知之不多、知之不深,也就很难发挥出管理工作的教育功能。

从管理的规范性来看,学生会自身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水平就不及校团委,加上学生管理学生也难以像教师管理学生那样拥有话语权上的优势,所以,校团委直管模式更加有利于社团管理的规范性。

四、北京大学社团管理模式的新探索

2005年12月,北京大学依托校团委成立了“北京大学学生课外活动指导中心”;2006年4月,北京大学第606次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了修订后的《北京大学学生社团管理条例》,将北大学生社团的管理、指导和监督单位由校团委换作了课外活动指导中心。

虽然到目前为止,北大校团委与课外活动指导中心还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具体承担课外活动指导中心日常工作的还是原校团委主管社团的职能部门——学生团体部,但是,这次调整并不是无谓的“换牌子”游戏,而是体现了北大在社团管理理念上的又一次跨越。

众所周知,共青团是政治性极强的群众组织,由校团委来管理社团,重在发挥政治把关、思想教育的功能,而新成立的学生课外活动指导中心在性质上属于教育行政机构,由它来管理社团,则主要侧重于教育引导、素质拓展的功能。可见,“翻牌子”的背后是“换脑筋”,标志着北大的社团管理工作已经进入了“育人为本、主动引导”的新阶段。

总结报告后的两周之内在未名 BBS 社团文体之家版面公示；

(五) 如相关社团对于活动分级结果存在异议,请于结果公示一周之内向指导中心秘书处递交复申请示,指导中心将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处理;

对于社团外出参加比赛等活动,需提交重大活动申请表,但不予以评级,比赛成绩可以登记在《北京大学社团负责人任职证书》中“社团所获奖励”一栏。

二、以人为本

(一) 在社团管理和服务中践行“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的核心和落脚点是服务学生成长,归根结底以参与社团的学生以及广大在校大学生为本,以是否有利于学生的成长与发展为本。

“以人为本”,一是在社团管理部门与社团的关系上,要突出以社团为本,强化服务职能,想社团之所想、急社团之所急、应社团之所需,积极为社团开展健康有益的活动创造条件、提供支持,不宜管得过严、统得过死,更不能人为设置障碍或加以不合理的限制;二是基于社团的“能人治理”特点,在管理社团的过程中,要突出以骨干为本,强化联系职能,与社团负责人和主要骨干建立起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良好关系,并要重视社团骨干的发现和培养,增进他们对学校育人理念和全局工作的了解,将他们紧密团结在党团组织的周围,成为推动学校改革、建设和发展的生力军。

“以人为本”的另一层含义是,虽然学生参与社团是完全自主的行为,但是由于社团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学生在选择上可能存在一定的盲区,因此,学校应该加强学生社团参与的指导,尽可能提供展板、手册和网络介绍等形式展示社团特色。另外,在本课题实证研究的微观分析部分,我们也发现了学生参与社团行为的一些特点,针对这些特点,也应该相应地给予学生一定的指导:

首先,加强对低年级本科生的社团参与的关注。根据我们的调研数据,低年级学生参与社团的比例远远高于高年级学生。这一人群数量庞大,实际指导需求也会相应比较大,这就决定了需要适当给予一定程度的指导。另外低年级的学生刚从高中生转变为大学生,从高中的应试环境进入自由的学习氛围,对于大学生活还不够适应,因而学业更容易受到影响。

民大学社团评议制度的主要特点和优势。由于社团数量不断增多,纸制的书面申请和审批方式不仅加大了社团管理部门的工作量,而且大大影响了社团活动的审批周期,给社团带来了不便。中国人民大学使用专门的 OA 系统处理社团活动的评议工作,实现了整个评议流程从申报到审批、评议、公布结果、补评的信息化,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也辅助做好了资料存档工作,便于将来对社团活动资料的检索和利用。

(资料来源:课题组中国人民大学调研走访材料,2009年1月)

三、建立社团分类指导机制

为了加强社团指导工作,要善于对形形色色的社团分类、分层、分级。

所谓“分类”,就是要根据性质定位、活动内容和关注领域等标准将社团划分为不同种类。每一类社团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和基本的规律,从而为指导工作提供一些具有普适性的方法和手段。

所谓“分层”,就是要根据社团组织的规范化程度和活动的品质,将社团划分为不同层次,据以确定对其的支持度。

所谓“分级”,就是要根据社团的规模、影响力、政治敏感度等因素将社团划分为不同级别,据以确定对其的关注度。

这三种分类方法中,“分类”体现的是社团横向上的差异性,“分层”、“分级”体现的都是社团纵向上的差异性。后两者的区别在于,“分层”的结果是“好中差”,可以作为奖惩的依据;“分级”的结果是“该不该多加关注”,可以作为监管的依据。

【资料 8.8】 北京大学探索建立社团分类指导机制

截至 2010 年 4 月,北京大学正式登记注册的学生社团总计 272 家(其中校本部 229 家),共分为八个类别,具体统计情况详见下表:

表 8.1

		政治理论	学术科创	体育健身	文化艺术	公益志愿	实践促进	合作交流	地域文化
总计	数量	10	78	50	61	21	12	25	15
	所占比例	3.68%	28.68%	18.38%	22.43%	7.72%	4.41%	9.19%	5.51%
本部	数量	7	74	38	49	15	8	24	14
	所占比例	3.07%	32.31%	16.60%	21.40%	6.55%	3.49%	10.48%	6.11%

根据成立年代,具体统计情况见下表:

专题报告一 北京高校优秀学生社团^①调查报告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高等教育改革的进行,学生的需求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班级、团委和学生会等传统组织形式为媒介的管理和教育已经远远不能完全满足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需求。在这种背景下,由学生自发组织的学生社团以开放的准入机制、多样化的组织架构、丰富的活动形式和广阔的主题内容获得了无数学生的青睐。优秀的学生社团为大学生的社会化提供了广泛机会,业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素质教育的重要平台和有效途径。

目前,高等院校学生社团的发展受到了各级教育部门的重视,也产生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对于优秀的高校学生社团的组织特征、发展策略和影响,仅有以个案分析为基础的定性研究,并没有探索性的抽样调查。为了有效加强对学生社团的指导,进一步提高高等院校的学生社团的发展水平,我们对北京市高校学生社团作了一系列探索性的抽样问卷调查。

在这一系列的问卷调查中,我们设计了专门供社团负责人填写的社团问卷。问卷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办法,在综合考虑了高校的所有制形式、学科结构、学生规模、社团管理体制等因素之后,我们从全北京市抽出了10所具有代表性的高校。然后再从10所高校中按照15%的比例抽取社团进行访问。本次调查累计发放社团调查问卷160份,回收155份,其中有效问卷151份。

① 本文所涉及的优秀社团,是指在各级评选中因社团工作出色而获得荣誉的社团。

模型 1: $\text{logitp} = a + b1\text{Activist}$

模型 2: $\text{logitp} = a + b1\text{Member}$

表 1 模型 1 和模型 2 的回归结果

	非标准化 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 标准误	Wald 值	自由度	显著性 系数	Exp(B)	模型整体 显著性系数
模型 1 (积极分子 为自变量)	0.011	0.005	5.392	1	0.020	1.011	0.011
模型 2 (会员人数 为自变量)	0.002	0.001	2.486	1	0.115	1.002	0.105

经过两次 logistic 回归,我们认为,模型 1 的回归系数和整体模型都具有显著性,而模型 2 的回归系数和整体模型都不具有显著性。

如果使用 T 检验,我们也可以发现类似的结论,样本中优秀社团积极分子的平均数为 49.50 人,而其他社团积极分子数量为 30.83 人,经过统计检验具有显著差别。在社团成员方面,虽然样本中优秀社团的平均规模为 157.12 人,其他社团为 124.28 人,但经过统计检验该差异并不显著,即造成误差的最可能的原因是抽样误差。

表 2 积极分子数量的分组统计数据

	个案数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其他社团	86	30.83	39.035	4.209
优秀社团	54	49.50	45.785	6.231

表 3 积极分子数量均值 T 检验结果

	Levene's 均方差检验		T 检验		
	F	Sig.	t	Df	Sig. (2-tailed)
假设方差相等	4.407	0.038	-2.576	138	0.011
不假设方差相等			-2.484	99.496	0.015

这就意味着:对于一个学生社团而言,社团的总体规模,即社团成员总数对学生社团的绩效不产生显著的影响;而积极分子的规模,才对一个社团的绩效具有显著影响。

在确定一般成员和积极分子的作用之后,我们对假设的最后一步,即核心领导层的投入对社团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进行检验。

我们使用社团负责人每周投入于社团工作的时间来衡量核心领导层的投入。首先使用 T 检验,得出以下统计结果:

(三) 高校学生自身就业意识和能力的差异较大

大学生群体在上个世纪的中国具有天然的优越感,他们一旦毕业就可以“分配”到国家给予的岗位上,一个个铁饭碗是这些岗位的基本形式,因此,大学生本身也不太需要专业的就业辅导和咨询。但在快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分配”这种就业形势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大学生也从原来的“天之骄子”变成了就业市场上的一般求职者,这些求职者根据自身的能力和素质的不同被贴上不同的价格标签,很多人由于基本素质的缺乏而成为“毕业即失业”的一分子。就业结构问题的产生,与当今大学生的就业准备不充分,特别是职业生涯规划意识与技巧的欠缺不无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同高校、不同专业的学生在求职策略和求职意识上也有相当大的差异,相对而言,经济类、管理类专业以及一些应用性比较强的专业,所在专业的学生在本科早期的就业准备意识会强一些,有很多大学生在大二暑假甚至大一就已经开始加入了“找实习”的行列,因为在求职方面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发展线索”,如果想要得到一份“特别好”的工作,就要有一份“特别好”的实习作为履历,而想要一份“特别好”的实习经历,就要有一份“比较好”的实习作为履历,因此求职准备的时间点便不断“前移”,而很多基础类学科的学生,相对于热门专业和应用性强的专业学科的学生来说,会晚进入状态一些,在很多人看来,一步耽误,就会步步耽误,因此,在整个校园中,包括大一的新生中,都弥漫着一种“就业焦虑”,就业服务类社团对指导形成健康的就业观以及提供相对扎实的就业训练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吸引了大量不同学科不同年级的学生参与其中。

二、就业服务类社团的三个细分类别

就业服务类社团根据其就业能力训练方向的差异,可以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与高校就业指导中心的功能较为类似,提供较为普遍性的求职技能,第二类以特定行业的求职技能培训为主,如投资、会计、新闻、公务员等,第三类则以特定求职阶段为特征,对兼职、实习、毕业求职等环节进行分类指导。

(一) 普遍性的就业信息获得和就业素质锻炼

通过对北京各高校学生社团的调查,我们发现,北京地区很多高校近年来相继成立了此类就业服务组织,如北京大学的“职业发展研究会”、“青年成才促进会”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Career 就业指导

究中,我们结合 10 所北京市高校的问卷调研数据,从宏观、微观两个角度,对社团教育、影响大学生的具体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的解析。在社团管理指导机制研究中,北京市高校社团运行层面和社团管理层面的一线工作经验为我们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有益的启发。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时任北京市委教工委副书记王民忠同志和教工委其他同志对此课题的关心和支持,感谢课题评审专家组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还要感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服装学院和吉利大学等兄弟高校对课题研究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郑萼、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魏国和团委书记张朱博等老师为课题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课题组组长张彦同志统筹协调课题立项申报、撰写和结题等各项工作,指导确定本书篇章结构和主要思路,并主持对全书进行多轮修改。韩流、郑清文、路鹏和姚建文同志承担了调查组织、书稿修订和部分统稿工作。孙凌、刘增、张硕、姚建文、林凌南、秦长运、汪远航、吕晓轩、鲍程亮、陈慧萍、谷宇辰、谢生金、汪金爱、张天然、张宇、吴情操、孙世鳌、薛松和郭小说等同志参与了本书初稿的撰写和编辑等工作。

北京大学“学生社团组织与学生社团成长成才关系研究”课题组
2012 年 5 月